

地方史研究

西藏古城春秋

马洪林

一九七六年夏至一九七八年夏，我受全校师生的委托，在西藏师范学院任教期间，曾有幸去后藏作为期半个月，驰驱二千里的社会历史调查。西藏人民创造过灿烂的文化，热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责任。在参观文物中，从西藏第一代工人到翻身农奴，从贫苦的普通喇嘛到进步的爱国活佛，都给我以很大教益。爰作《西藏古城春秋》，以为研究西藏历史存一资料。

容光焕发的边疆古城

——日喀则

一九七七年十月五日，西藏高原风霜高洁，秋高气爽，我们从拉萨动身去后藏作千里之行。上午从曲水大桥驶过了滔滔的雅鲁藏布江（藏语，从高山上流下的雪水），沿拉（萨）日（喀则）公路前行。岗巴拉山（藏语，高高的山）直插云霄，横亘前路，我们驱车沿“之”字形公路攀岩上升，直到中午时分，才达峰顶。昔日走这一路，是蹈洪波而攀悬崖，决生死于俄顷，马为却行，人为涕下，艰难险阻，可以想见。岗巴拉山高达四千四百公尺，是前后藏的分界线。从山巅回眸远望，白茫茫的雅鲁藏布江，在雪山峡谷中蜿蜒湍流，有如一条洁白的飘带，抬头前眺，

清冽碧透的高原牧地之湖——美丽的羊卓雍错（错，藏语中的湖）映入眼帘。羊湖面积广大，周围大约有二百六十多公里，因湖水清碧，镶嵌于群山之中，有松耳石的翠绿，藏语中称为“高原牧地松石湖”。银岭雪嶂，湖光山色，秋水长天，气象万千，真使人心旷神怡。所以，藏族同胞都把哺育过西藏文化的雅鲁藏布江比作慈祥的母亲，把俊俏的羊卓雍错比作美丽的女儿。高原上气候变幻无常，时而雨雪交加，黑云笼罩山川；时而阳光灿烂，山山水水反射着耀眼的光芒，颇有“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的奇趣。在暮色苍茫中，我们到了历史名城——江孜。

第二天早晨，我们沿年楚河谷进发。年楚河谷是西藏著名粮仓，此时正值一年一度秋收大忙季节。从江孜到日喀则，满眼一片秋色。俄而，隐隐青山之中，渐渐露出一座闪光的城市，这就是我们向往已久的边疆古城日喀则。

日喀则位于祖国的西南前哨，年楚河与雅鲁藏布江的汇流处，海拔在四千公尺以上。这里有三万居民，主要是藏族，还有回族、汉族和夏尔巴人，是西藏第二大城市。

日喀则建城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早在十五世纪的时候，西藏帕木竹巴地方政权乃乌宗（县）宗本（县长）南喀桑布的兄弟在仁

布建宗，那里有个庄园，名叫“溪卡桑珠则”，意为“六个狮子山下的庄园”，日喀则是它的缩写。所以，今天的日喀则人还把日喀则读作“溪卡则”。

公元一四四七年(明正统十二年)，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巴(后被追封为一世达赖)在日喀则开始兴建札什伦布寺(意为吉祥的堆集)，历时十二年，建成了显宗大殿及释迦、弥勒、渡母三个佛堂。因此，日喀则又叫札什伦布。迨及明末清初，四世班禅洛桑曲结掌权，他在历朝清廷扶持下，札什伦布寺不仅成了班禅喇嘛坐床之所，而且逐年扩建，成为拥有建筑面积三十余万平方米，喇嘛四千人的巨大寺院。札寺位于日喀则西南，依山傍水，气势宏伟，四周筑有城垣，方圆三华里，为西藏黄教四大寺之一。

登其殿宇，但见金顶紫檐交相辉映，壁画及诸供养极尽妍丽，雕梁画栋，层楼叠屋，依山而上，有序不乱，俨然一巍峨壮观的宫殿群矣。寺内还保存有历代班禅的“乔坦”(藏语，灵塔)，收藏着各种稀世瑰宝和珍本经典，其豪华可与拉萨的布达拉宫相媲美。

在札寺强巴佛堂，我们看到了中国最大的镀金铜佛强巴佛(藏语，未来佛)。这座高大的强巴佛堂为九世班禅所建。一九一四年动工，一九一七年建成。它有九层楼三十公尺高，佛像高二十六点七公尺，用黄金五百五十八斤，黄铜二十三万一千七百五十斤锻打而成，外饰贵重宝石三十个，大珍珠三百个，肚内装有一万克青稞(一克二十八斤，合二十八万斤)，还有经书、酥油、金银、氍毹等人间生活用品。他的眼睛就像一对横卧的巨人。过去，朝佛顶礼的人们往往只能瞻礼铜佛的下部，而无缘看到他的尊容，给人以“仰之弥高”的感觉。这尊佛像构图严谨，线条柔美，表现手法概括而洗练，充分反映出我国西藏人民的艺术才智。

然而在旧西藏，就在这号称“佛国净土”的寺院之中，演出的却是人吃人的悲剧。札

寺是旧西藏的最大领主之一，它下属四个宗(县)和五个相当于宗的独立溪卡(大庄园)、六十八个小溪卡(小庄园)、二十六个牧场，占有土地二十余万克(亩)，牧畜三万余头，占有农奴十六万余人。札寺是班禅的主寺，下有分寺二百三十多座，僧尼达九千一百五十多人。札寺设有法庭、监狱等一整套暴力机构，对其属民横征暴敛，残酷奴役。各种徭役租税多如牛毛，可以叫上名目的就有三百多种。据七世班禅向清朝驻藏大臣呈报之《札什伦布寺岁租岁费》记载，札寺每年剥削收入为粮食五百一十六万余斤，酥油二十五万余斤，黄金一百零三两，白银三千二百四十一两，马草和烧柴各一千零五百余万斤。剥削量达到农奴一年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广大农奴被迫陷入悲惨世界，挣扎在死亡线上。

宗教生活在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占有重要地位。佛、僧、法，沆瀣一气，谓之佛教“三宝”，而喇嘛在藏语中含有神化的意味：“喇”是至高无上的意思，“嘛”是众生之母，通称上师。可是，所有寺庙的喇嘛都是划分为阶级的。寺内等级森严，法规凶苛，对号称“佛门弟子”的广大贫苦喇嘛，其剥削之残酷和统治之狠毒也是世上罕见的。贫苦喇嘛一踏进札寺的门槛，就要被迫领取各种所谓“玛札”(高利贷)，且规定只准交息，不许还本。如布多米村(米村，寺院学经单位)的“线加玛札”，本钱为藏银三十两，而每年的利息竟高达藏银二百五十两。宗噶米村的贫苦喇嘛欧珠，被诬不守寺规，先后被抽了五千余皮鞭，残无人性的上层喇嘛还在他的伤口上浇开水，最后开除山门，流放荒郊。

解放前，日喀则这个后藏的政教中心，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农奴制度的摧残下，街道狭窄肮脏，房屋破败不堪，一万四千居民中，却有四千“邦占”(藏语，乞丐)，到处充斥着三种声音：农奴主的皮鞭声，喇嘛的念经声和农奴的呻吟声。

解放后，日喀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你站在札寺之巅俯瞰全城，但见一排排新建筑沿着年楚河谷地西侧向南伸展，栉次鳞比的铅皮顶新房，闪闪发光，新市区等于老市区的四倍。从前没有一家工厂的消费城市，现在建立了电力、机械、食品、皮革、印刷、粮食加工、汽车修配等工厂，还新建了百货公司、新华书店、邮电大楼、医院和电影院，以及十几所中小学。日喀则是日喀则地委所在地，也是西藏西南部的农牧产品集散地和交通枢纽。历史上交通闭塞的高原古城日喀则，如今公路四通八达，而中尼友谊公路就经过这里。

西藏和祖国融合一体的 历史见证——萨迦寺

十月九日，日喀则地委文教局的次日副局长、文管会的桑竹同志和我去文化古城萨迦参观文物。一出日喀则，车子就象一叶扁舟，在喜马拉雅山（梵语，雪之家）“山的海洋”中游弋。蓝天的朵朵白云，在高原烈日照射下，半呈白絮状，半呈水粉状，构成大自然的美景。我们沿着中尼友谊公路在山中盘旋，除了山坳里的公路道班之外，很少见到村落，“空山不见人”的寂寥之感油然而生。十二时许，我们过了仲曲（曲，藏语中的河）上的萨迦大桥，山回路转，离开中尼公路左转进入仲曲河谷。过去，从这里骑马走上半天才能到萨迦。现在沿河傍山修了一条简易公路，不到一小时，从车窗前望，就看到一幅壮丽的景色：幽谷深处，一座红色古代城堡，随着跳动的车窗，慢慢升上地平线来。这就是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中叶西藏地方的政教中心——萨迦。

我们在萨迦三天，两次进入萨迦寺参观，请该寺管理员多边欧珠和老喇嘛介绍寺的历史和珍藏的文物，获得了书本上从未获得的知识。

萨迦教派是西藏喇嘛教中以昆氏（《元史·释老传》作款）家族为主创立的一个派别。

因为僧人可以娶妻生子，俗称花教。萨迦派创立于十一世纪，从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中叶，它是西藏地方占统治地位的政教势力，它的领导人物曾任职中央朝廷，掌管全国各地的佛教事务。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祖国版图，这一派的领袖人物起过一定的作用。其中，萨班·贡噶坚赞（一一八二——一二五一）和他的侄子八思巴（一二三九——一二八〇）是汉藏蒙关系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

十三世纪初，蒙古势力崛起于北方。一二三九年，元太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曾派他的将官达尔汗多达那波率军入藏，到达拉萨以北的热振寺和杰拉康寺一带，鉴于前后藏的复杂政教形势，他建议阔端选用当地宗教领袖协助蒙古统治卫藏全区。据五世达赖所著《西藏王臣史》一书中记载他的话：

“现在卫藏地方以噶丹教派的寺庙为最多；达鲁教派的僧人戒律清整；止贡教派的京俄大师具大法力；萨迦教派的班智达学富五明”。结果，他们选中了声誉隆盛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班智达是一种学衔，藏人通称能通“大、小五明”的人为班智达，意为大学者。小五明是《诗词》、《韵律》、《修辞》、《歌舞》、《星算》。大五明是《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据《大唐西域记》释五明谓：“一曰声明，释诂训字，涂目疏别。二工巧明，技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灸。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玄奘：《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标点本，第三十六页）可见，萨班（萨迦班智达的简称）是位名噪一时的大学问家，在西藏享有很高的声望。

公元一二四七年，萨班和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达成西藏归顺蒙古的协议，由萨班写了一封公开信，劝说卫藏僧俗各派势力归附蒙古，这封信至今还保存在萨班的全集里。从此，卫藏地区正式归入祖国版图，萨

迦派也取得了西藏地方政教领袖的地位。这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开始。

公元一二五三年，八思巴（意为圣者）曾晋谒元统治者，忽必烈一家门以俗人见师僧仪节礼八思巴，并先后从受密教灌顶。一二六〇年（元中统元年），忽必烈即帝位，封八思巴为国师（后名帝师）并赐玉印。一二六四年，忽必烈设总制院（后更名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卫藏地区的政教事务，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八思巴还依忽必烈旨意，据藏文字母创蒙古新字字母四十一一个，曾风行一时。八思巴因造字有功，更升号“大宝法王”。

公元一二七六年（元至元十三年），八思巴返回萨迦，忽必烈命太子真金率军一直护送到萨迦寺。一二八〇年（元至元十七年），八思巴卒于萨迦，忽必烈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元史·释老传》）。从这长达三十六字的绝美谥号中，可以看出蒙藏统治者打得火热的情况于一斑。但是，萨迦派领袖人物力主西藏归入祖国的版图，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符合蒙藏汉各族人民的愿望，这是应予肯定的。

萨迦派是因这一派的主寺萨迦寺得名的。萨迦寺始建于公元一〇七三年（宋熙宁六年）。到八思巴时代，依恃元朝政府的支持，遂征调匠工，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庙宇。在仲曲北岸造起了“古隆木”（藏语，恐怖神的宫殿）大殿和“乌则”（藏语，最高）王宫。公元一二六八年（元至元五年），建成了萨迦大寺。萨迦寺分为两个札仓（藏语，读经学院），通称南北二寺。南寺叫杜瓦札仓，即萨迦大寺，是专学显教经典的；北寺叫鄂巴札仓，即“古隆木”大殿和“乌则”王宫，是专修密法的。

我们在萨迦大寺金碧辉煌的大经堂里，参观了上万部的元代前后的佛教经典，雕刻精美的鳞鳞印版，栩栩如生的佛像慈尊，琳

琅满目的宋元古瓷，历史悠久的彩色壁画。这些珍贵的文物，简直可以构成一部翔实的蒙藏汉友谊的编年史。

大经堂内竖有四十根顶柱，庄严古朴，直通藻井。其中最粗的达一点五公尺，最细的也在一公尺左右。它们的名字更是饶有兴味，第一根最大的叫：“甲那思钦噶瓦”（藏语，内地元朝皇帝送的柱子）；第二根叫：“重卜噶瓦”（藏语，公野牦牛送的柱子）；第三根叫：“达卜噶瓦”（藏语，公老虎送的柱子）；第四根叫：“那卜查杂噶瓦”（藏语，海神送的流血的柱子）。这样宏丽壮观的建筑，不仅在西藏建筑物中屈指可数，即在全国历代古建筑物中也不逊色。萨迦大寺兴建时，内地来了很多汉族工匠。它不特继承了藏族人民建筑的特点，而且具有元代建筑的风貌，在建筑格调上融汇蒙藏汉合璧的优美，是祖国各兄弟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更是西藏和祖国融合一体的历史见证。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 英雄城市——江孜

从日喀则返回拉萨途中，我们在江孜逗留了五天。我第一次从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上读到江孜人民抗英斗争的烈烈功业，就为藏族人民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反侵略精神所震撼。曾多次梦想到抗战遗址上一游，今日竟如愿以偿。这一回，我们在江孜县委的帮助下，沿着江孜人民抗战的疆场，追寻当年抗战的史迹，走访抗战英雄的子孙，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见《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六百多年前，江孜叫“娘堆”。因为它地处年楚河上游，而年楚河过去就叫娘水，“堆”在藏语中有上部的意思，故名。那时候，昌都地区有个叫郎吉帕巴的人，不远千里，来到萨迦拜佛学经，得到萨迦法王的赏识，

就把江孜封给了他。约当一三六五年（元至正二十五年），他在宗山上开始修建寺庙、政府、监狱等政教机构。从此，江孜成了年楚河谷的政教中心。后来，他的后人又建造了一座著名的白居寺（全称“白贡居德”，意为吉祥的寺庙）和一座白居塔（藏语叫“贡布”，意为万佛之塔）。白塔耸立河畔，紫檐白墙的寺庙高踞山腰，高大的红色寺墙依山势而透迤，构成了一座风光如画的迷人宗教城市。正像江孜民歌《格桑拉》赞美的那样：“明镜样的江孜地方，好比一个盛玉的大盘。”这期间，江孜的政教统治者把娘堆更名为“协尔规江则”（意为高而看得远的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协而规江则”慢慢简化成了江孜。

江孜南倚喜马拉雅山，北临雅鲁藏布江，过去是西藏的三大城市之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抗英城市，素有英雄城的美誉。参观中最使人感奋不已的是江孜抗战的中心战场——宗山。这座位于江孜城畔的险峰拔地而起，像一座傲然挺立的钻天峰，耸入云天。登上峰顶，脚下年楚河绕城而过，江孜城的街街巷巷，寺庙屋宇，一览无余。它不仅是江孜的眼睛，更是江孜的屏障。

一九〇四年春（藏历木龙年），当年楚河两岸还春寒料峭，冰雪未消的时候，英帝国主义从印度派出的一支由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率领的万人“远征军”，一路烧杀抢掠到了江孜。他们焚烧村庄，捣毁寺庙，屠杀人民，抢劫财物，江孜平原受到亘古未有的外国强盗的铁蹄蹂躏。我们到白居寺参观时，寺内一尊大铜佛上，至今还保留着英国侵略军用刀砍伤的痕迹。对于英军的掠夺行为，当时的《伦敦日报》曾有这样的报导：“数星期来，英兵运其劫掠所得之赃物至印度者，络绎不绝。英国兵官之妻子友朋，欢欣逾常；彼等筑在山坡之房屋，顿时恢复四年前劫掠北京（按系指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役）后之状况。”（转引自《待

解放的西藏》，新华书店版，第四十五页）在这次侵藏战争中充当急先锋的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在他所著的《旅藏二十年》一书中也供认：“一千九百零五年一月，我因有特别职务，被派到加尔各答，担任分类编订图书及珍贵物品目录工作。这些东西，就是同威德尔大佐在西藏搜集的，件数的多，须有四百多骡子才能驮运。里边包括有许多珍贵而稀罕的喇嘛书籍、神像、宗教作品、盔甲、武器、图画、瓷皿等物。”（麦克唐纳：《旅藏二十年》，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版，第二十六页）

可是，江孜人民不可侮，他们不分男女老少，纷纷拿起土枪、大刀、长矛和鄂多（大型弹弓）奋勇杀敌，誓死保卫祖国，保卫家乡。从工布、塔博、波密、雪达拉等地区开来了“玉马”（普通藏民组成的民兵）一千多人，各地寺庙还开来了“色马”（普通喇嘛组成的僧兵），爱国商人把江孜的羊毛捐献出来，在山头上垒成了羊毛防线。他们在哲林代本（“代”是弓箭，“本”是长官，就是武官，相当于团长）指挥下，坚守宗山两个多月。糌粑吃完了，他们就从石缝里挖土吃，水喝光了，他们就喝自己的尿，使宗山巍然屹立在年楚河畔，挡住了敌人进攻拉萨的去路。每当夜幕降临，从高高的宗山上，抬枪和土炮就喷射出长长的火焰，发出震荡大地的怒吼。

七月五日，英军集中炮火猛轰宗山。突然，宗山上的火药库一声巨响，烈焰腾空，宗山上的火药库爆炸了。在宗山守军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敌人黑压压地爬上来。哲林大吼一声：“拿起石头、木棒，抽出腰刀，我们要把敌人赶下去！”英勇的战士们用石头，木棒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但是，由于我国经济技术的落后，战士们没有先进的武器回敬敌人。当时，侵略西藏的英国头目柏尔（Charles Bell）说：“西藏人之勇敢虽足惊叹，而缺乏军事训练，所用军械多系本地自

造之古式鸟銃。此物与剑皆非近代军火敌。”（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商务印书馆版，第六十二页）热爱祖国的战士们，在敌人重炮、来复枪和马克沁机关枪射击下，宁死不屈，为了祖国的荣誉，中国人民的尊严，纷纷纵身跳下悬崖，壮烈殉国。

管理宗山的藏族老阿爸，指点着这险山要塞，使我们看到了英军枪击在佛堂廊檐下的累累弹痕，战士们在山头储水的石池。我们巡礼着石砌的古堡，站在雄伟的炮台上，临风而立，遥想当年，仿佛听到了它发出的震耳雷鸣，好像看见了藏族战士奋勇杀敌的矫健身影。江孜古堡的威武雄姿，庄严地向

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发出警告：谁敢侵犯祖国这块神圣的领土，必将自取灭亡！

凭吊这历史的古堡，缅怀抗战的忠魂，不禁思绪翻腾：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从海上来的，有从陆上来的，有从正面来的，有从背后来的。英帝国主义不仅从海上进攻，也从“世界屋脊”的背后来犯。帝国主义侵略者不仅在东南沿海受到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而且在西藏高原也遭到藏族人民的坚决抵抗。江孜抗战在中国人民近代反帝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西藏人民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马裕藻悼鲁迅的挽联

鲁迅先生逝世后，各界敬悼的挽联甚多，而马裕藻（幼渔）的挽联，真乃令人回味无穷。其联云：

豫才尊兄 千古
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薊汉阁
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

弟 马裕藻 敬挽

上句表彰鲁迅与章太炎的师承关系，下句颂扬鲁迅与李大钊的战友之谊。悼鲁迅而又追念章太炎和李大钊，一幅挽联，痛悼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三位伟人。

太炎晚年，设馆讲学于苏州，自称“薊汉阁主”。一九〇八年，鲁迅仰慕“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与留日同学许寿裳、钱玄同等，去《民报》馆听太炎讲《说文解字》。鲁迅是深受太炎民主革命思想和文章风格的影响的，到晚年，仍以太炎先生的弟子自居。

李大钊，河北乐亭县人，故称之为“乐亭君”。他是《新青年》的编委之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功绩，永彪史册。李大钊就义后，鲁迅曾作《〈守常全集〉题记》，热烈颂扬李大钊是位“先驱者”，称他的遗文是“革命史上的丰碑”，并公然宣称“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鲁迅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并肩战斗，谊深情长。

鲁迅从民主革命斗士跃进而为共产主义战士，在这发展路途上，同民主主义革命家章太炎和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思想影响，也是分不开的。鲁迅好友马裕藻，深知其情，悼之真切。

（晓东）